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二辑）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二辑)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 (上、下)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晚清史学科 晚清史论丛第二辑)

ISBN 978 - 7 - 5097 - 1006 - 7

I. 晚… II. ①中… ②河… III. 社会发展史 - 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K252.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4386 号

CONTENTS

(上)

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

- 兼论《清代稿钞本》的编辑出版 桑 兵 / 1
- 晚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方之光 / 18
- 清末制宪修律与辛亥革命 邱远猷 / 27
- 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的紊乱
- 透视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层矛盾 魏光奇 / 47
- 晚清地方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 刘 伟 / 61
- 晚清自强新政与立宪运动的经纬及其影响 程全生 / 77
- 独断与合议：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与运作 关晓红 / 90
- 丙午官制改革与责任内阁制的命运
- 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 李细珠 / 115
- 1906 年中央官制改革与人员安置问题 潘 鸣 迟云飞 / 133
- 试论甲午战后“因时制宜”谕引发的讨论 李元鹏 / 153
- 试论清末新政时期道德教化政策的调整 张小莉 / 164
- 清末直隶士绅的宪政诉求与实践 徐建平 / 174
- 清末新政对民生问题的恶性操作与社会矛盾 陆兴龙 / 183
- 胡林翼与湘系群体关系论要 董丛林 / 195
- 张之洞、袁世凯关系与清末政局 谢 放 / 213
- 关于清末北洋集团的一点看法 马平安 楚双志 / 232
- 清末军事学堂与近代军人集团 华 强 何小帮 / 248
- 广东勇营与晚清军事改革 何文平 / 258

清末列强侵华战争对中国军工的刺激与影响	王晓华 / 273
清末中国中华主义的形成过程	斋藤道彦 / 287
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 密谋活动	王宏斌 / 307
清政府对中外条约关系的认识和调适	李育民 / 330
邓廷桢与广东禁烟问题	吴义雄 / 345
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耆英的制夷思想与实践	王开玺 / 372
咸丰朝东北失地百万于俄原因探析	徐万民 / 388
论庚戌鼠疫期间各国对于中国防疫主权的 干涉和侵夺	焦润明 张冬梅 / 404
端方与美商一桩未予诉讼的经济官司	崔志海 / 417
论外债在晚清宪政历程中的特殊作用	马陵合 / 429
清末法制改革与治外法权	康大寿 康黎 / 446
中国金融的现代转型和困顿	吴景平 / 460
晚清民初货币制度中的国家制度与民间惯例	戴建兵 / 472

（下）

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与铁路敷设争论	金志焕 / 483
设想与努力：19 世纪 90 年代挽救华茶之制度建构	朱从兵 / 497
清末四川巴县八省客长与度量衡纠纷	洪成和 / 517
20 世纪初地方政府与经济倡导 ——直隶工艺总局及其经济活动评析	吴宝晓 黄文学 / 526
晚清证券思想述论	刘志英 / 539
论徐桐的自强观	苑书义 / 555
从斌椿到孙中山：论晚清国人铁路观的演变	陈三井 / 570
晚清程朱陆王之辩略议	史革新 / 583
圣贤学问与世俗教化 ——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与纲常名教关系辨析	张昭军 / 610
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	黄顺力 / 627
论冯桂芬的慈善思想与实践	黄鸿山 王卫平 / 638

“西学中源”说与晚清诸子学的实用取向

——以墨学为中心的考察	张永春 / 655
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与清末民初媒介表述的政治	王天根 / 670
论辛亥革命后价值承当的丧失与所谓“道德失范”	武吉庆 / 694
何启、胡礼垣《新政变通》研究	李谷成 / 703
传统与现代接合、中国与西方融合：孙中山革命思想的 文化检视	黄 城 匡思圣 / 717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谢俊美 / 732
奕讷与古银杏传奇	王明灿 / 741
清末浙江谘议局议员选举述论	沈晓敏 / 766
伍连德笔下的晚清官员：经验、记忆和历史	黄贤强 / 780
晚清物权债权中的民俗民风 ——以房产契约中的民事习惯为例	郑永福 陈可猛 / 792
天地会的入会仪式和戏剧	李平秀 / 813
近代传媒与汉口公共领域的建构（1866~1919）	汤 黎 / 832
科举革废与制度变迁	李传斌 / 844
晚清：传统性别制度受到的挑战	吕美颐 关 耳 / 858
论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	何晓明 / 875
清末新式学堂教师群体的出现及其影响	张立程 / 890
晚清新政时期乡民毁学述论	杨齐福 / 898
从火花上看晚清史	黄汉森 / 910
晚清淮安的圩砦	顾建娣 / 918
后 记	/ 928

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

——兼论《清代稿钞本》的编辑出版

桑 兵

今人研治晚近历史，常常遭遇资料易得而难求其全的尴尬，由此引发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难题，直接关系到研究的高下得失成败。其中至少有三点牵涉全局。其一，迫于史料繁多而不得不缩小范围，分段分类的专门之学日趋精细。可是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性逐渐丧失，反过来具体研究的准确度也会大打折扣。其二，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要想穷尽史料也几乎不可能。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出手，变得难以捉摸。其三，由于资料收藏和学人境遇的限制，资料接触处于不对等状态，又片面强调或理解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结果人所周知的书都不看，一心搜寻前人未见的材料，且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以看得到掩饰读不懂的局限。或者以垄断材料为研究基础，反而过度依赖对于材料的垄断，导致研究某人即以其材料为视野，不看相关材料，最终势必以其是非为是非；或者以某一类资料为可靠，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一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而且容易误判错解。以上三点相互作用，导致本来具有综合性的历史研究日益支离破碎。而这一切，均与晚近史料边际的模糊相关联。近年来苦思冥想破解之方，以为唯有打破收藏、学术、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晚近各类文献资料，使得不同地域、境遇的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改变那种以为历史大体和真相基本还尘封于人所不知的秘笈之中的误解，不仅有助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献收藏机构乃至藏书私家摆脱资料保存与公众利用的两难，而且促使学人将研究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史事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内在联系，从

而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尤其是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近人的文本及其思维行为。



历史研究的史料边际，首先是整体的规模、范围与系统。史学为综合的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读完书然后再做研究，所谓“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问，莫不皆然，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①可是，这样的常轨正道在晚近史的领域，却显得悬的过高，相当奢侈，甚至强人所难了。中国文化发达甚早，为了维系千差万别的广大地域的统一，巧妙运用文言分离的功能，极其重视文字的功效，与之相关的发明多而且重要。中国古代典籍号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世界范围看，此言不虚。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当年即因为治上古社会史没有材料而转向中国。可是与晚近比较，古代史的资料显得相当有限。四库全书共收书 3500 余种，存目 6800 余种，禁毁书约 3100 余种，合计也不过 13000 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乾隆以前清人著述（仅存目书即约十居四五）。关于清代的著述，《清史稿·艺文志》和武作成编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共收录清人著述 20000 余种，王绍曾主持编纂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之外，著录清代著述 54000 余种。而据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仅诗文集一项，即达 40000 余种之多。除去乾隆以前重合部分，也已经超出修四库之前中国书籍的一倍。换言之，清代典籍的数量大大超过历代的总和。^②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典籍，在整个清代文献中只占一部分，而且还是小部分。中国大陆档案馆系统收藏的清代档案共 2000 余万件（册），其中 50% 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余散置于各地方档案馆。这还不包括私家收藏的档案以及图书、博物馆系统所藏的档案（其实档案只是存放资料的类型，而不是资料的类型。档案中的函电、官文书等，很难与其他机构或私人的收藏区分。清季谘议局文件，在各地即分别入藏档案

①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 1 卷第 1 期，1955，第 6 页。

② 参见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总序》；辛德勇《谈清人著述的目录与版本》，《中国图书评论》2005 年第 8 期；蒋寅《一部清代文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清人别集总目〉评介》，《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 年第 3 期。

馆或图书馆)。台湾地区 and 欧美、日本等国,也分别收藏数量不等的档案,总数至少有数十万件。^①

报刊为清代史料的又一大类,而且数量更加巨大。明以前也有一些勉强可以算是报刊的文献,不仅数量少,价值也相对较低,所谓断烂朝报。清季以来则大不同,数量大幅扩增,内容极为丰富,反映社会各个层面。据统计,自1815年中国有近代报刊创刊以来,至1911年,在中国和海外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136种。^②就种类而言,清季报刊的数目似不算多,不少报刊的寿命较短,可是也有相当数量的报刊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发行卷数多,尤其是日报,日积月累,且越往后版面越多,篇幅越大。清季报刊受体制和立场的局限,道听途说与一面之词不在少数,若将不同背景的报刊相互比勘,并与其他类型的资料参证,可以补充连续性活动和细节的不足,并且测量社会的反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阅报,可以回到历史现场,与近人感同身受,从而对当时的人与事具有了解之同情。

各种形式的民间文书,数量同样庞大,仅各大图书馆藏家谱就有20000余种。这类材料,以前一般不为学人所注意,五四新文化以后,才开始收集。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收集并展出风俗物品,遭到非议。除个别类型之外,各公私图书馆还是少有收藏。近年来,随着研究层面的下移,这类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但与资料的数量相比,收集工作的规模进度,仍嫌不足。

以上所述,仍有不少遗漏。如晚近人物的日记、函札乃至诗文集,未刊者甚多,仅日记据说已经掌握信息的就有千余种。近来编辑出版的《清代稿钞本》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共收录日记22种、诗文集140余种和清季广东谘议局及相关文件2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目录书未曾著录。有的早已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如杜凤治的《望鳧行馆日记》。杜氏由幕而官,同光年间在广东多个县为官,每日记事颇详,史料价值极高。后续各辑也多有未刊稿钞本。如晚清广东大儒之一的陈澧,一生著述极多,随著随刻,又不断修改,留下大量手稿,内容与坊间刊本多有不同。由于种种原因,稿本仅存其半,利用极难,而据原稿钞录的钞本

① 参见冯尔康《清史史科学》(沈阳出版社,2004)第4章“档案史料”、邹爱莲《清代档案与清史纂修》(《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史和、姚福中、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前言”,第1页。



大体完整。翻译书和教科书，为晚近新有，前者关系中外，后者为知识载体，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目录较少著录，迄今为止，连数目也不能完整掌握。目前海内外关注者甚多，而所见明显不足，仓促立论，未能至当。档案方面，晚清中外交通频繁，各国公私档案（包括政府的外交、殖民、移民、军事、商务部门，教会、公司、传媒、国际性团体组织等机构，以及相关个人），大量涉及与中国的关系，陈寅恪早年批评民初撰修清史过于草率，特别指出：“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此岂私人所能为者也？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可。”^①如将海外各类档案著述收罗完整，史料的数量还将大幅度扩增。

文献的几何级递增，与印刷技术、出版机构的改进普及密切相关。晚清70年，时间约占清代的1/4，文献数量的比例却远不止此数。民国以后，出版扩张的速度更快，北京图书馆根据北京、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的藏书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5），共收录37年间出版的各类中文平装图书12.4万余种，超过整个清代文献的总和。档案方面，据《全国民国档案通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编委会的不完全统计，中国1000多家各级档案馆共收藏民国档案1400万卷，即使平均1卷只有10件，也是明清档案的7倍。报刊更加惊人，截至1949年，中文报刊的总数至少达到4万种以上（其中报4000余种，刊36000余种），照此估算，则清季报刊仅占1/30。

如此大量的资料，任何一类，都已经超过中国历代各类资料的总和，叠加在一起，令人有不堪重负的压迫感。一般学人能力或有不及，而最重史料功夫的史学二陈，不免也会望洋兴叹。熟悉多国文字，又勤于翻检旧籍的陈寅恪，“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②，少年即立志读完中国书，后来尤其讲究史料与史学的关系，他比较上古、中古、近代的史料多寡与史学研究的差异，认为：“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着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

① 陈守实：《学术目录》，《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② 陈守实：《学术目录》，《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于无所措手足。”^① 1940年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就史料一点感叹道：“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②

主张治史要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同样苦于近代史料的漫无边际。他说：“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于是主张：“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③ 这与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分科治学的时尚相一致，清季学人即将中国既有学问附会西学分支，胡适、梁启超等人的整理国故，也提倡专史研究。

缩短战线，分门别类，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史料繁多，无法尽阅的难题，但也带来不少偏蔽。其最大问题，当在割裂学问的整体性。由于书多读不完，不可能读完书再做研究，而收缩分类等于将整体肢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导致盲人摸象，坐井观天，不仅学问的格局不能大，无法通，更使得窄而深的局部研究发生扭曲变形。具体表现为：其一，治学不识大体，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④ 如今只在教科书层面接受一些常识甚至套话，接着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又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因为不知前人已知，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其二，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难免盲人摸象，无法庖丁解牛。或以为横切竖切，总能深入核心，殊不知若无大局整体，问题意识于见仁见智，见树见林之外，很容易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为树林。^⑤ 而学人又不甘于局部边缘，贯通无能，却好以各种名义将局部放大

①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第52页。

②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72页。

③ 约1929年12月3日致台静农，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80页。

④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第5页。

⑤ 杨联升：《敬挽萧公权先生》，杨联升著，蒋力主编《哈佛遗墨——杨联升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第87页。



为整体，以落草为寇为占山为王。一方面不断细分化，一方面又夸大其专门为引领时趋，力图放大所据之点，以侏儒充巨人。不知具体研究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意义，很难拿捏得当，恰当好处。其三，因为不知大体，无法了解前人著述的意思，于是以为前人无意思，将所有书当作材料，只能借助外来后出的现成框架系统，先入为主，尽量使材料脱离时空联系，随心所欲，断章取义，隔义附会。否则不仅不知材料有何意义，甚至不知什么意思。其四，以分科观念看前人前事，强史事以就我，将历史人事纳入现成框架，曲解附会。由此可见，必须把握大体，才能研究具体。

二

分门别类的研究在失去整体性的同时，并不能真正解决史料边际模糊的难题。目前已知的近代史料已经不胜其繁，而扩张的速度幅度又极大，再具体的题目，要想穷尽材料，也戛戛乎其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书 54880 种，编撰者仍然坦承“未见书目尚多”^①。况且，各书目大都依据前人所编目录，并未核对各馆库藏原书，从《清代稿钞本》的编辑以及其他相关情况看，各图书馆有书无目或有目无书的现象不在少数。非公共性的公家图书馆，既不对外开放，管理人员又缺乏专业训练，编目更难完善。而博物馆系统，限于体制，所藏文献均作为文物，内部人员也难得一见庐山真面。至于私家收藏，秘不示人，尚有许多信息未曾公开。尤其是近人的函札、日记、著述等未刊稿本，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为数不少。

《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辑原则是必须见书，因而有目无书的就只能阙如。线装书、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图书暂未收录。《中小学教材》仅收录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部分藏书，未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及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相关藏书。少年儿童读物，则三家图书馆漏藏或不入藏者较多。台湾、香港及边远省份出版的图书收藏也不全。此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书籍因为政治、道德等原因遭到禁毁，其中既有政府行为，也有行业（如书业公会）自律，尤其是后一种情况，销毁相当彻底，海内外公私收藏甚少。这些都影响了收录的完整性。加之书目的编

^①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前言》，《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上册，中华书局，2000，第 22 页。

辑未兼收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藏书，虽然后来调查认为遗漏不多，只有10%左右。可是因为基数太大，10%就是12000种，几乎相当于清以前历代图书的总和！

报刊方面，据中国50个省市级以上图书馆所藏，仅1833年至1949年9月的中文期刊，三次编目，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1961年首版未收录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党刊、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建国前解放区出版的期刊，以及国统区出版的部分进步刊物。1981年增订本加入上述部分，共收中文期刊近20000种。据“编例”，“仅收录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品种。县级以下的期刊和有关中小学与儿童教育的期刊，酌量选收。至于纯属反动宣传、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不予收录。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录。”^①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从1985年底起，由北京图书馆（后更名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持，全国56个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参加，编辑了一本补充目录，共补收期刊16400余种，其“编辑说明”特意强调：“其中包括：珍贵革命刊物，国民党党、政、军刊物，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刊物，中小学教育刊物，儿童刊物，文艺刊物等”^②。与增订本相加，近代中文期刊总数当在36000种以上。报纸据统计约4000余种，仅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制作成缩微胶卷的就有2900种。晚清民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年代，所重主要还在古史，而各类古史新资料相加，与近代史料的扩张速度幅度相比，真可谓九牛一毛。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各项编目工作严重滞后，规模不断扩张，系统无法把握的史料状态，研究者的确很难做到胸有成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史料繁多，目录不全，学人反而不注意由目录入手，把握整体，探索系统。不要说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态度从目录看学术的渊源流变，作为索引的功能也未予以足够重视。近年来接触各校研究生，不少人博士毕业，还不知道多种目录书的存在，更谈不上利用。何况目录不能仅仅作为查询的索引。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料掌握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

① 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第2页。

②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主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第1页。

至可以修正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判断和方向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会改变，便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

一般认为，近代史资料搜集不难，判断也相对简单，因而容易立论。胡适就说：“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① 他劝罗尔纲治近代史，理由便是“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② 甚至陈寅恪也一度认为：“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③ 揆诸事实，不能不说前贤的这些意见多少低估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史料制约史学的程度。

由于晚近史资料边际模糊，引证、论述与评判，往往主观随意，见仁见智成为信口开河的托词。与古代史尤其是唐以前的研究相比，这样的指责的确无可否认，尽管宋以后已有类似问题，而且训练不够的学人在新材料减少的情况下，也出现一味用旧材料重新解释的偏蔽。可是晚近史的研究无疑更为突出。治古史的学人好以自圆其说为立论的起码准则，可是在晚近史研究中，先入为主往往也能自圆其说。本来立论必须贯穿解释所有相关资料而无碍，而晚近史料边际不定，难以穷尽，看朱成碧，亦可言之有据，无论正反，均不易验证是否能够条贯所有的材料与史事。最为典型的事例，当为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因不信官书，而作关于钱谦益两次被捕时间的长篇考证，居然能够成说。^④ 至于当今学人普遍采用的因果论证与条件判断，割裂材料与史事的时空及内在联系，任意拼凑组装，形成观点，虽然都有不少论据，却不能贯通所有材料与史事，甚至不得不故意扭曲史事，强材料以就我。以此方式论证，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多种相异相反的观点，并且均能够提出支持论据。如此，则立说不难，却于解决问

①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557页。

②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增订本），三联书店，1995，第28页。

③ 杨联升：《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清华校友通讯》1970年4月29日。

④ 参见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634～638页。

题毫无帮助，无法实质性地推进研究。由于材料繁多，捕风捉影也能自圆其说，何况看朱成碧。

材料繁多使得研究的层面可以进一步深入扩展，同时也加剧了掌控史料与研究关系的难度。古代史多重制度文化，晚近则首重人事，人为历史主体，最为复杂。而材料难得其全，却导致在活跃的思维心理层面不易驾驭把握得当。处理史料与史学的关系，需要更加精细而具可操作性的办法。在古史层面，所谓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或主料与辅料，又或者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等等分别，于史事真伪的判定关系极大。一般而言，这样的判断固然不错，可是比照材料与事实之间的复杂性，还嫌表面。近代学人强调有几分材料出几分货，但材料不会直接说明事实。或者说，材料只会展现记录人所知和所以为的事实。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除了最简单的真伪是否之外，如何才是真的问题相当复杂。梁启超即认为：“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并指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原因，一是“真迹放大”^①，二是记载错误。^②

所谓第一手资料的真与对，其实也是相对而言。历史上所有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角度、关系、层面等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千差万别，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因，在于立足点的远近高低各不同，罗生门的现象相当普遍。前贤所谓以汉还汉，只能剔除后人的迭加，不能区分当时的异见。就此而论，所谓真至少有两个层次，即史事的真与记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只有一种，但人们必须根据各种相关记述来还原史事，而即使亲历者关于史事的记述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间接材料的差异往往由此敷衍而来。当事人的记述无论由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因素的作用所产生的差异，间有放大或掩饰的故意，却不一定是有意作伪，不仅所记大都是真（当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更重要的是，他们如此这般或那般记载这一史事，同样是真。前者是他们的眼见为实，后者固然有部分隐晦，但他们如此记述，仍然是真实心境的写照。研究历史，一方面通过比较不同的记述逐渐接近史实，另一方面则要探究不同的当事人何以记述不同，尤其是为何会这样而不是那样记述。史事的真与相关人心路历程的真相辅相成，只有更多地了解所有当事人记述的心路历程，才有可能更加贴切地接近所记事件的真实。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第31、91页。

②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6、80页。



古史材料遗存有限，仅凭断简残篇，很难深入这一层面。陈寅恪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学界多注意上述文字，而忽略下面这段话：“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陈寅恪虽然表彰冯友兰的著作“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利用材料别具特识，^①可是他批评民国学者“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又声明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有心与清儒立异外，不愿图画鬼物，当是重要原因。^②

晚近史料遗存的丰富详尽，使得学人不必依据残篇断简神游冥想，但是因为数量过多，边际模糊，形成雾里看花，盲人摸象，仍然难免穿凿附会的流弊。有鉴于此，处理史料与史学关系的办法，也须较研治古史深入一层。具体而言，既然当事人的记述各异，不可能与事实完全重合，但又并非伪，而是部分真，则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权威性其实难以断定，至少无

①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280页。朱自清记：1933年2月13日浦江清与之论著述，“以为只总结帐及划时代之作为价值，述古多而创新少则不足论。冯芝生哲学史，渠意当属此类。”又3月4日记：陈寅恪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196、202页）。浦江清所说，显然是陈寅恪的意见。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0页。

法区分其中可信的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较为可信。所谓第一手资料所能证明的问题，大体上只是时间、地点、相关人物、大体过程等等比较简单的部分，至于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相关作用的详情究竟如何，一般难以以哪一位当事人的记述为准。所以，所有类型的资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实，只有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相关记述，并且四面看山似地比较不同的记述，即所谓俱舍宗式地前后左右了解语境，理解文本，把握错综复杂的彼此关系，或许可以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在此过程中，探究相关当事人何以如此记述与了解事实的真相相辅相成，史实永远不可能完全还原，但是，随着对相关史料的掌握逐渐增多以及了解各自记述差异的潜因逐渐深入，史实的真相可以多层面地逐渐呈现。就此而论，所谓重建史实，迄今为止，仍然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缺一不可。一再强调要将历史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化，尤其是生物学地质学化的傅斯年不得不承认：“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有时后人神经过敏，多想了许多，这是常见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设一迷阵，以欺后人，而恶作剧，也是可能的事。这真是史学中最危险的地域啊！”^①正因为如此，高明的史家重建的史实，其实是再现历史场景、人物关系乃至各自具体的心理活动，所有历史人物原景实地再度复活，如演戏般重新演历一番。不过再现的途径是严谨的考证，以实证虚，而非文学的创想。

恰当分门别类的前提，是能够准确把握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相互关系，否则指鹿为马而不自觉。材料与史事之间，本来存在受时空约束、无限延伸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整体，很难探究具体。畛域自囿之下，分段分类的研究，在解读材料，条贯史事方面，由于不能清晰了解把握史料边际，未免有几分盲目，研究者心中无数，不知向何处下手，也不知何时可以出手。谨慎者束手，胆大者妄为，琐碎化与随意性相反相成，都在侵蚀晚近史研究的整体性。要想完全防止分科治学之于专题研究的偏蔽，至少目前条件下难以做到，只能尽力减少其负面作用。首先，应知分乃人的天赋功力以及外界条件有限，不得已的无可奈何之举，不要畛域自囿，更不能坐井观天，盲目自大。即使身陷其中，也要努力超越其外。无此远大志向，自学则害己，教书则误人。其次，不以专家之学自矜，虽然现代教育体制下难以先博而后约，读完书再做学问，早已让章太炎等人断

^① 《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341页。